

交往异化与劳动异化：马克思早期异化论再探

——从《穆勒评注》一处误译谈起

李彬彬，周思妍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1)

摘要：在《穆勒评注》的中文版中，马克思关于交往异化与劳动异化关系的一处重要表述出现了误译。按照对德文原文的正确理解，马克思将交往异化视为劳动异化的前提，这反映出马克思早期异化论的重要思想突破，即其关注点从个体自身的劳动异化转向个体相互关系的交往异化。从《德法年鉴》时期开始，马克思已经关注自我异化与社会关系异化问题，并且认为消除社会关系异化是消除自我异化的前提。经过《巴黎手稿》对劳动异化与交往异化关系的探索，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明确论述了交往异化与劳动异化的经济学内涵，指出交往异化是劳动异化的前提。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对交往异化和劳动异化这两个哲学术语做出了经济学的解读。马克思从社会经济变革的角度寻求个体异化的现实破解之路，这是对传统唯心主义异化论的本质变革。由此，马克思早期异化论的发展过程本身孕育着唯物史观的因素。

关键词：马克思；异化；交往异化；劳动异化；《穆勒评注》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26)01-0144-10

《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简称《穆勒评注》)是马克思巴黎时期的一份重要手稿，它对异化理论做出了重要的丰富和拓展。这一理论也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通过比对德文原文和中译文，笔者认为在《穆勒评注》中，关于交往异化与劳动异化的关系的一处重要内容可能存在误译。该句原文是：“Das Verhältniß des Tausches vorausgesetzt, wird die Arbeit zur unmittelbaren Erwerbsarbeit.”^[1]正确译文应是：“在交换关系的前提下，劳动成为直接谋生的劳动。”但它的中译文却为：“交换关系的前提是劳动成为直接谋生的劳动。”^{[2](174)}这一误译的后果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丰富内涵未能被全面充分地揭示出来。例如，这一异化理论往往被视为唯物史观创立前的理论探索，而忽视了该理论对于唯物史观本身形成的重要意义。本文重新探讨《穆勒评注》的这一处误译，并以此为基础分析马克思关于交往异化与劳动异化的内涵及其关系的论述。这不仅有助于澄清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内涵，而且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这一理论对于唯物史观创立的意义。

一、《穆勒评注》一处误译的纠正及其对相关学术争论的回应

一直以来，《穆勒评注》都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综合来看，当前国内外学界对《穆勒评注》的

收稿日期：2025-08-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对黑格尔主义的批判与唯物史观的创立研究”(22BKS006)

作者简介：李彬彬，男，河南息县人，哲学博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基础理论，联系邮箱：being521@126.com；周思妍，女，湖南郴州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基础理论

讨论重点是马克思在该文本中对“交往异化”“谋生劳动”“货币异化”等内容的讨论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巴黎手稿》)中的“劳动异化”思想是何种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穆勒评注》和《巴黎手稿》在写作时间和思想水准上是何种关系。对于以上问题,当前国内外学界主要有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穆勒评注》的写作时间早于《巴黎手稿》,是后者的准备。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四十二卷就是以这一原则编辑的^{①[3]},张一兵支持这种观点^②。对于《穆勒评注》和《巴黎手稿》的关系,张一兵认为前者的思想水准低于后者,“前者是在经济学话语之中‘半截子’跳出来的哲学批判话语,而后者是马克思完全自觉跳出经济学的哲学批判”^[4]。在张一兵看来,马克思将劳动异化视为社会关系异化的根源,这一发现标志着马克思的重要思想发展:“马克思从社会关系异化直接提出人的本质异化之根源是劳动活动的畸变,这是马克思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最初建立。”^[5]根据这种观点,《穆勒评注》中的社会关系异化关注的是主体间性的异化,《巴黎手稿》中的劳动异化则直接关注主体本身的异化。其背后的理论逻辑是,马克思的关注点从流通领域转移到了生产领域。这种观点较早地探索了《穆勒评注》与《巴黎手稿》的写作顺序与思想关系,对于深入探析马克思早期异化思想的发展历程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第二种观点认为《穆勒评注》的写作时间在《巴黎手稿》第一笔记本之后、第二笔记本和第三笔记本之前。较早提出这种写作顺序的是苏联学者拉宾^[6],在国内以韩立新为代表^③。韩立新提出,《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思想在思想水准上高于《巴黎手稿》第一笔记本中的劳动异化思想:“交往异化在思想水平上高于异化劳动,《穆勒评注》在理论上也比《第一手稿》成熟,我们应该遵循《第一手稿》在前《穆勒评注》在后的文献学顺序解读《巴黎手稿》。”^[7]这种观点认为,《巴黎手稿》第一笔记本的“异化劳动”理论还停留于“孤立人”的预设上,《穆勒评注》之后则开始关注交往异化,这种交往异化思想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前提条件。正是在《穆勒评注》的基础上,马克思在《巴黎手稿》第二笔记本和第三笔记本中才进一步讨论了私有财产运动和社会关系的异化及其扬弃。该观点认为,这种转变是马克思发现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重要思想萌芽。这种观点引入了与马克思早期文本写作顺序相关的文本学新材料,对于强调马克思早期交往异化思想的独特理论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穆勒评注》大致写于《巴黎手稿》之后。这一观点最早由以英格·陶伯特(Inge Taubert)为代表的MEGA²编委会成员提出,具有广泛影响。陶伯特是国际著名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家,负责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内的MEGA²的编撰工作。在1982年出版的MEGA²第一部类第二卷中,以陶伯特为首的编者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产生及其保存情况进行了说明,提出马克思的《穆勒评注》很可能写在《巴黎手稿》之后,“而李嘉图和穆勒著作的摘录很可能是在写了第三个笔记本以后,即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后才写的”^{④[8]}。另一位国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家、MEGA编辑专家尤根·罗扬(Jürgen Rojahn)原本在1983年采取的是第二种观点,后来也转向了陶伯特的这种观点:“我在1983年得出结论:马克思早在写作‘第二手稿’之前就已经完成了《李嘉图摘要》和《穆勒摘要》。……但是,现在我倒是更倾向于英格·陶伯特的观点,即《李嘉图摘要》和《穆勒摘要》是在‘第三手稿’之后才诞生的。”^[9]目前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表示认同。例如,鲁克俭提出要以“陶伯特说”为依据研究马克思巴黎时期的文本:“‘陶伯特说’既已成为MEGA²编委会所接受的文献学结论,理应成为中国学者进行马克思巴黎时期文本解读研究的文献学依据。”^[10]姚顺良也表示基本赞同陶伯特的说法,指出马克思《穆勒评注》中的“谋生劳动”思想是对《巴黎手稿》中的“异化劳动”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并且《穆勒评注》中对分工和交换的关注也预示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唯物史观初步形成的理论发展方向:“马克思通过对‘劳动异化的根

源’的追问,进一步提出了‘谋生劳动’概念,将关注点集中到‘分工(和交换)’上,迈出了‘用分工说明异化’的第一步,预示了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初步论证历史唯物主义的‘泛分工论’方式’。”^[1]这种观点认为,《穆勒评注》中对于“分工”“交换”“谋生劳动”的讨论深化了《巴黎手稿》中对于“劳动异化”的讨论。这种观点基于马克思早期文本研究的最新成果,突出了《穆勒评注》中交往异化思想的理论价值,近年来逐渐为国内外学界所接受。

这些学术讨论对于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的复杂性及其思想史地位提供了重要参照,但也陷入了争论不止的局面。综合来看,相关争议的实质和核心正在于如何理解马克思早期异化论的思想逻辑,即《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论同《巴黎手稿》中的“劳动异化”论是何种关系。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从“交往异化”到“劳动异化”的转变是一种深化,是从交换领域深入生产领域,是从主体间性领域深入主体自身活动的领域。持第二种和第三种观点的学者虽然在判断《巴黎手稿》第一笔记本和第二、三笔记本的思想关系上存在分歧,但是他们都认为,从“劳动异化”向“交往异化”的转变是一种深化,因为这意味着马克思的研究进入了社会关系领域。

经过对上述三种观点的分析,不难发现第一种观点同第二、三种观点之间的分歧在于,在马克思早期的异化理论中,到底是“劳动异化”理论更深入地研究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还是“交往异化”理论更深入地研究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或者说,“交往异化”理论同“劳动异化”理论是何关系?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需要认真辨析马克思原文对于二者关系的讨论,即马克思到底是如何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的。不幸的是,在现行的《穆勒评注》中文版中,有一处关于“交往异化”和“劳动异化”之间关系的重要论述出现了误译,这更为争论各方提供了“弹药”,加剧了观点的分歧。

在马克思巴黎时期留下的笔记文本群中^⑤,《穆勒评注》之所以一直以来受到广泛关注,就在于它对于“交往异化”“谋生劳动”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深刻的讨论。在《穆勒评注》现行的中文译文中,有一句话因为明确表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所以一直以来都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引用,并且多用以论证谋生劳动(劳动异化)对于交换关系(交往异化)的根本性意义。这句话就是:“交换关系的前提是劳动成为直接谋生的劳动。”^{⑥[2](174)}

然而不幸的是,这句话的中文译文却是错误的。其原文是:“Das Verhältniß des Tausches vorausgesetzt, wird die Arbeit zur unmittelbaren Erwerbsarbeit.”^{⑦[1]}《穆勒评注》现行的中文译文把德语中的“vorausgesetzt”译为名词“前提”,为了语句的通顺,就把后半部分处理成了“dass”引导的从句。也就是说,现行的中译文把前半句话处理为主句,把后半句话处理为从句。但是,从语法层面来看,这样做明显不对。因为,前半句话的“vorausgesetzt”是过去分词形式,不能把它译为名词。后半句话的“wird”在句首,不能处理为“dass”引导的从句。因为如果后半句话是从句,那么其中的“wird”应该置于句末,而非置于句首。这样来翻译的话,马克思原文在语法上就是错误的。在语法层面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前半句话是从句,后半句话是主句,这样所有的语法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也就是说,“vorausgesetzt”这个过去分词的功能是条件状语,含义是“在……的前提下”,这样来看,前半部分“das Verhältnis des Tausches vorausgesetzt”整体上是条件状语,正确的译法是“在交换关系的前提下”,后半部分“wird die Arbeit zur unmittelbaren Erwerbsarbeit”的正确译法为“劳动成为直接谋生的劳动”。这样来理解整个句子,马克思的原文将不存在任何语法错误。所以,这句话的正确译法应该是:“在交换关系的前提下,劳动成为直接谋生的劳动。”其中,作为关键词汇的“vorausgesetzt”的动词原形是“voraussetzen”。根据德语《杜登词典》,“voraussetzen”这个词主要有两个含义,一是作为预先存在的、给定的事物来接受,二是作为必要的前提条件来要求。可见,其含义主要是条件预设上的必要性,同时包含了时间顺序上的先在性。结合全句考察,可以发现交换关系是谋生劳动在必要性和先在性两个方面的前提。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的译文准确地反映了德语的语法结构,而没有出现中译文中的误译情况,也可作为参考。这句话的英文版译文是:“The relationship of exchange being presupposed, labour becomes directly labour to earn a living.”^[12]在英译文中,“vorausgesetzt”被翻译为“being presupposed”,意为“在……的前提下”,准确体现了德语原文中条件状语的语法结构。按照英译文来看,这句话的意思为,在“交换关系”(“the relationship of exchange”)的前提下,出现了“劳动成为直接谋生的劳动”(“labour becomes directly labour to earn a living”)这个结果。

指出这一翻译错误,并不是单纯的咬文嚼字。因为正如上面指出的,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关于《穆勒评注》研究的热点难点问题都是该文本中的“交往异化”与《巴黎手稿》中的“劳动异化”是何种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穆勒评注》和《巴黎手稿》在写作时间和思想水准上是何种关系。把这句话的中文译文从“交换关系的前提是劳动成为直接谋生的劳动”改变为“在交换关系的前提下,劳动成为直接谋生的劳动”,那么“交换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交换关系是交往异化的形式)同“劳动成为直接谋生的劳动”(在马克思看来,谋生劳动是劳动异化的形式)之间的关系将变得完全不同。

《穆勒评注》这句话的现行中文译法有助于强化第一种观点。因为按照现行译法,“劳动成为直接谋生的劳动”是“交换关系”的前提。这首先意味着,从研究“交换关系”转到研究“劳动异化”是对“交换关系”的前提进行研究,是更深入一步的研究。其次,在生产四个环节中,生产是交换的前提,《穆勒评注》重点研究的是交换环节,《巴黎手稿》的“劳动异化”重点研究的则是生产环节。修正后的译文完全颠倒了“交换关系”与“劳动成为直接谋生的劳动”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其深层的含义是,从研究“劳动异化”到研究“交换关系”是一种深化,因为“交换关系”是“劳动异化”的前提。

二、《穆勒评注》对“交往异化”“劳动异化”及其关系的论述

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不仅详细地说明了交往异化与劳动异化的经济学内涵,而且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直接和明确的论述。马克思指出,交往异化既是劳动异化的前提,又是劳动异化的表现形式。从中也可以看出,马克思对劳动异化和交往异化的研究并未停留于哲学层面,而是深入了社会经济层面。

首先,马克思从经济学的角度阐述了“交往异化”的含义,将交换和分工视为交往异化的形式。马克思认为,在生产过程中,人的活动的交换和产品的交换均具有类活动的意义。这是因为,每个人在满足自己个人的需要、积极实现自己的本质的同时,也在创造相互之间的社会联系、积极实现社会本质,“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2](170)}。但是,如果现实的个人作为这种社会联系的主体发生了异化,那么“这种社会联系就以异化的形式出现”^{[2](171)}。一方面,人的劳动产品的交换以物物交换的异化形式表现出来。马克思提到,国民经济学将交换和贸易视为社会交往的本质形式,然而交换和贸易实质上是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在现代市民社会中,“人同人的关系”表现为“私有者同私有者的关系”。既然私有财产是私有者的本质存在,那么将私有财产转让给另一个人就意味着使私有财产外化。如果这种转让不是因为“强制”,那么就只是因为一个人需要另一个人的劳动产品来实现自己的本质。但是在私有制下,人们只能通过转让自己私有财产的一部分来获得对方的私有财产,使两个私有者之间发生相互关系的是私有财产“物的特殊的性质”。马克思进而指出,在私有制下,人们的社会交往表现为“私有财产的相互外化”,“两个私有者的社会联系或社会关系表现为私有财产的相互外化,表现为双方的外化的关系或作为这两个私有者的关系的外化”^{[2](173)}。这意味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异化为交换,而交换事实上是私有财产的相互外化关系。另一方面,人的活动本身的交换以

分工的异化形式表现出来。马克思指出,正如人的劳动产品之间会进行相互交换一样,人的活动本身也会有相互交换和相互补充。但在私有制下,这也发生了异化,以分工的形式表现出来,“活动本身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交换表现为分工”^{[2](175)}。

其次,马克思从“谋生劳动”的角度进一步深化了对“劳动异化”的阐述,指出劳动异化的经济根源在于交换和分工。一方面,交换导致劳动异化为“谋生劳动”。在马克思看来,谋生劳动是异化劳动关系的顶点,而异化劳动关系之所以发展到“谋生劳动”,正是因为交换关系的存在。原因之一是,劳动者的劳动活动与劳动产品同劳动者的需要之间不存在任何直接关系,而是由对劳动者而言异己的社会组合所决定的。原因之二是,劳动不是劳动者个人存在的积极实现,而只是为了获得收入以实现维持生活的目的。在此基础之上,马克思提出了“谋生劳动”的四个规定:其一是劳动同劳动主体相异化,其二是劳动同劳动对象相异化,其三是劳动者为满足利己的需要而被迫服从社会需要的强制,其四是劳动者的活动只是实现维持个人生存这个目的的手段^{[2](175)}。因此,在私有制下,由于社会权力的增大,人会变得更加利己和没有社会性,从而同人的本质相异化。另一方面,分工导致异化的物对人的全面统治。人的劳动本来是统一的,但在分工之下,这种统一却必然被视为分离,因为“社会的本质只在自己的对立物的形式中、在异化的形式中获得存在”^{[2](175)}。由于分工的发展,对于单个人而言,产品和私有财产的材料更加地作为等价物出现,而不再表现出自身的物的特殊性质。因此,人们已经不再只是交换自己的劳动产品余额,而是生产对自己而言“完全无关紧要的物”,为的是换取货币这个等价物的代表、“交换的中介”。货币既与“私有财产的特殊性质”完全无关,又与“私有者的个性”完全无关,因此货币“表现出异化的物对人的全面统治”^{[2](175-176)}。

最后,马克思从经济学意义上阐述了“交往异化”同“劳动异化”的关系,指出交往异化既是劳动异化的前提,又是劳动异化的表现形式。

一方面,交往异化是劳动异化的前提。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首先论述了“交往异化”,然后论述了劳动异化为“谋生劳动”,在从“交往异化”过渡到“谋生劳动”时,过渡句正是本文前面重点分析的误译句。根据对此句原文结构的分析,马克思明确提出交往异化是劳动异化的前提。马克思指出,如果生产是“社会的生产”,亦即“人为了作为人的人而从事的生产”,那么人们之间的交换无非是“那种证明我的产品是为你而生产的产品的中介运动,因为我的产品是你自己的本质即你的需要的对象化”^{[2](180-181)}。作为人的生产的情况是这样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他人。一是人们使自己的个性及其特点对象化,在活动时享受了生命的表现,在对产品的直观中认识到自己对象性的个性。二是在对方使用自己的产品时,认识到自己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使人的本质对象化并创造出与另一个人的本质需要相符的物品。三是人们成为彼此与类之间的“中介”,认识到彼此是对自己本质的补充。四是人们在自己的生命表现中直接创造了他人的生命表现,在个人活动中直接证实和实现了人的本质即社会的本质。但在私有制下,人的活动的交换和产品的交换异化为分工和交换,所以不仅劳动异化为谋生劳动,而且异化的物实现了对人的全面统治。一方面,劳动不再是自由的生命表现,而只是为了获得生活资料。另一方面,劳动这种活动成了活动的假象,只是被迫的劳动。

另一方面,交往异化是劳动异化的表现形式。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本和地产彼此的分离,以及一种劳动同另一种劳动、一种资本同另一种资本、一种地产同另一种地产的分离,最后,劳动同劳动报酬、资本同利润、利润同利息以至地产同地租的分离,使得自我异化不仅以自我异化的形式而且以相互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2](176)}马克思在这里所使用的“自我异化”与“相互异化”分别对应劳动异化与交往异化。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同它自身的分离”是劳动异化,而“工人同资本家的分离”“劳动同资本的分离”等是交往异化。国民经济学往往把这种劳动异化与交往异化视为某种事实和偶然的東西,孤立地考察生产和消费以及作为二者中介的交换和分配。然而,马克思认为,交往异化并

不是与劳动异化相独立的现象,其本身就是劳动异化的表现形式。因此,生产和消费以及诸如此类的分离,事实上等同于劳动自身的分离。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强调劳动、资本、地产之间的相互分离,劳动、资本、地产内部的相互分离,以及劳动、资本、地产同自身收益之间的相互分离,使得劳动异化不仅以劳动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以交往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里,马克思用的是并列结构(sowohl als),这意味着劳动异化与交往异化无非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

综上所述,《穆勒评注》是马克思异化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马克思开始重点关注交往异化问题,而在此之前马克思对异化的关注则集中于劳动异化。劳动异化主要是个体自身的异化,因此对交往异化的关注反映出马克思对个体之间的关系异化的重视。第二,马克思开始从经济学的角度探析交往异化和劳动异化的实质内容及其根源,而不再只是主要从哲学的角度探析异化。由此,马克思从经济学的角度将交往异化的实质内容明确表述为分工和交换,并用谋生劳动的经济学术语说明劳动异化的哲学术语。第三,马克思明确提出了交往异化与劳动异化的关系,既将交往异化视为劳动异化的前提,又指出交往异化是劳动异化的表现形式。可见,劳动异化是交往异化所导致的,并且通过交往异化表现出来,二者之间具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三、《穆勒评注》中“交往异化”与“劳动异化”新见的思想史价值

《穆勒评注》是马克思巴黎时期的一份重要笔记,其中关于“交往异化”和“劳动异化”的讨论具有重要的思想史价值。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关于交往异化和劳动异化的关系的思考,不仅是对《德法年鉴》和《巴黎手稿》相关论述的进一步推进,而且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做了重要准备。

第一,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关于交往异化和劳动异化的关系的思考,是对《德法年鉴》和《巴黎手稿》相关论述的进一步推进。

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主要关注的是自我异化,不过其中也隐含了社会关系异化的前提性预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提出对现实的自我异化展开批判。马克思肯定了当时的德国思想界将宗教归结为人的自我异化这一理论成就,并进一步指出宗教中的自我异化是对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中的自我异化的反映。由此,马克思提到当前的任务是从宗教批判转向政治国家批判,将矛头对准社会现实中的自我异化:“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13](4)}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批判了现代市民社会中的自我异化。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消除社会关系的异化才能真正将人从自我异化中解放出来:“如果有一种社会组织消除了经商牟利的前提,从而消除经商牟利的可能性,那么这种社会组织也就会使犹太人不可能存在。……并转而反对人的自我异化的最高实际表现。”^{[13](49)}这意味着,在马克思看来,犹太人要获得解放,并不能纯粹通过个人思想意识上的解放,而是必须通过社会关系的改造来消除经商牟利的前提。一旦社会现实使之丧失存在的可能性,犹太人的宗教意识将由于不再有对象而自行消失,这是扬弃自我异化的根本路径。因此,虽然马克思在这一时期主要关注的是自我异化,但在探索扬弃自我异化的方案时,由于认为社会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前提条件,也隐含了社会关系异化相对于自我异化的前提性预设^⑧。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虽然以劳动异化作为异化理论的核心,但也首次将交往异化作为异化的重要内容提出。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第一个规定是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第二个规定是人同自己的劳动活动相异化;从这两个规定推出第三个规定,即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前三个规定的直接结果是第四个规定,即“人同人相异化”(die Entfremdung des Menschen von dem Menschen)。前三个规定主要在劳动异化的范围内,分别是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活动和类本质

相异化,第四个规定作为对人与人相互关系的论述,实质上也涉及交往异化的层面。事实上,马克思本人对第四个规定非常重视,在提出后甚至连续三次对此进行了强调。最开始,马克思强调交往异化是劳动异化的现实化,只有通过交往异化,劳动异化才会表现出来:“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13](164)}在这里,马克思所讨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限于前文中的工人之间的关系,指的是人们相互之间用工人的尺度进行观察。紧接着,马克思再次对此进行强调,不过这时所讨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还必须注意上面提到的这个命题: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13](165)}正是因为工人的劳动为资本家所统治,工人的劳动才会发生异化,这意味着交往异化事实上成为劳动异化的先决条件。由此,马克思第三次对该命题进行了强调,指出交往异化是劳动异化的现实条件:“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13](165)}

第二,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关于交往异化和劳动异化的关系的思考,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做了重要准备。

首先,马克思对异化的关注重点由劳动异化向交往异化转移,这种交往异化维度的凸显反映出马克思早期异化论的唯物史观发展方向。从《德法年鉴》时期到巴黎时期,马克思从对异化的哲学思考逐渐深入经济社会领域。而从《巴黎手稿》的三个笔记本到《穆勒评注》,马克思关于交往异化与劳动异化关系的认识也出现了明显的深化和发展。马克思既在探讨劳动异化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交往异化的根本性意义,又更多地从经济学的层面深刻地剖析了异化及其产生的根源,从而实现了对传统异化论的变革,并最终孕育出唯物史观。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中,马克思最终提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3](501)}这一命题将人的本质置于社会关系之中,可以被视作对交往异化与劳动异化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同时,马克思强调要对这种人的现实本质进行批判,这也与此前对扬弃交往异化与劳动异化的思考相承接。

其次,马克思认为交往异化是劳动异化的前提,这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重要前提条件。《穆勒评注》明确将分工和交换作为交往异化的内容,并且认为这是劳动异化的根源所在。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对此进行了更为深刻和科学的论述。马克思从分工出发剖析了所有制,指出分工的形式决定个人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的关系:“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13](521)}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劳动之所以发生异化,正是因为分工仍然是自然形成的分工,而不是出于自愿的分工:“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3](537)}这些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是对“交往异化是劳动异化的前提”这一命题的实质性发展。

最后,马克思强调只有消除交往异化才能消除劳动异化,这种从社会关系的整体变革来消除异化的路径是唯物史观相对于唯心史观的重要贡献。唯心史观关于消除异化的方案,可以从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个形象的比喻看出来:“有一个好汉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重力思想迷住了。如果他们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方说,宣称它是迷信观念,是宗教观念,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13](510)}在唯心史观看来,异化的产生来源于思想意识,异化的消除仅仅通过思想意识的改造即可。与此相反,马克思指出异化的产生有其现实条件,异化的消除也需要具备现实条件,即无产者队伍的壮大及其与资产者的对立,这是社会关系层面的:“这种‘异化’(用哲学

家易懂的话来说)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13](538)}马克思认为,劳动异化的消除同交往异化的消除是相互适应的:“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同过去受制约的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往的转化,也是相互适应的。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13](582)}马克思强调,异化有其现实根源,因此无法通过改造单个人的思想意识来实现变革,而是必须从社会关系的变革入手。这呈现出与唯心史观本质的不同。通过探寻人的解放的现实路径,“马克思完成了哲学史上的本体论革命,形成了以社会关系本体论为核心的‘新世界观’,开启了以人的解放为目标的探索之路”^[14]。

第三,关于学界争议的《巴黎手稿》与《穆勒评注》的写作顺序与思想水准问题,本文认为《穆勒评注》写作于《巴黎手稿》之后,并且《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思想相较于《巴黎手稿》中的劳动异化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巴黎手稿》三个笔记本到《穆勒评注》,马克思的关注重点由劳动异化转移到了交往异化,同时从经济学角度更为明确地界定了劳动异化与交往异化的内涵,由此也发现了交往异化与劳动异化之间的实质性联系。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在经济社会层面的研究逐渐深入,进一步突破了哲学理论层面的探析。

一方面,交往异化取代劳动异化成为论述中心。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首次将交往异化作为异化的重要内容提出,相较于此前的文本有了更进一步的思想发展。但是,马克思将交往异化视为异化劳动的最后一个规定和前三个规定的直接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是将交往异化视作劳动异化的产物和结果,总体而言仍然是围绕异化劳动这一理论核心展开论述。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则明确提出交往异化是劳动异化的前提和现实表现形式,由此交往异化事实上被视作相较于劳动异化更为根本的维度。

另一方面,劳动异化和交往异化有了更为明确和直接的经济学内涵。《巴黎手稿》将交往异化规定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异化,将劳动异化规定为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活动与类本质的异化。《穆勒评注》则在此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对于交往异化,《穆勒评注》在经济学意义上将交往异化分为人的劳动活动的交换、人的劳动产品的交换两方面,分别对应分工和交换。对于劳动异化,《穆勒评注》提出谋生劳动是异化劳动的顶点,并在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的基础上,提出了谋生劳动的四个规定。可见,从《巴黎手稿》到《穆勒评注》,马克思从经济学的角度进一步界定了交往异化与劳动异化这两个哲学术语。

四、结语

马克思很少直接论述交往异化与劳动异化的关系,然而这种关系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早期的异化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确理解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的这句重要表述,有助于厘清交往异化与劳动异化的关系,进而有助于全面认识马克思早期的异化理论,乃至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发展历程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如果采信本文的结论,那么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异化理论的核心内容不能仅限于《巴黎手稿》中的劳动异化思想,而且包括《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思想。更进一步说,对于马克思早期异化论的理论结构而言,交往异化是劳动异化的前提条件,劳动异化是交往异化导致的结果。从文本顺序和思想水准的角度来考察,通过比较《巴黎手稿》与《穆勒评注》中的异化理论的具体内容,可以发现《穆勒评注》在写作时间上大致迟于《巴黎手稿》,《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思想在思想水准上也高于《巴黎手稿》中的劳动异化思想。这样一来,学界关于《穆勒评注》写于《巴黎手稿》之前的文本顺序的判定、劳动异化思想高于交往异化思想的思想水准的判定,这种观点可能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从《德法年鉴》时期关注社会关系异化问题以来,马克思关于交往异化

与劳动异化的经济学思考逐渐深入,并且将交往异化视为比劳动异化更为根本的维度,这反映出马克思早期异化思想通向唯物史观的理论发展方向。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最终提出,人的本质不是抽象的本质,而是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关于对现存的人的本质的批判,作为自我异化的劳动异化也是根源于作为相互异化的交往异化。只有通过社会变革,人才能真正破解异化,成为现实的自由的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进一步分析了分工与所有制的关系、分工与劳动的关系、交往与劳动的关系、“异化”的实际消除路径,这也是对交往异化与劳动异化的思考的实质性发展。由此可见,马克思早期异化论的发展过程本身孕育着唯物史观的因素。

注释: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该卷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四十二卷译出。
- ② 张一兵的相关观点见:张一兵《马克思:从他性交往异化到劳动异化——〈穆勒笔记〉再研究》,载《河北学刊》2022年第3期;张一兵《经济学批判中的人本学话语——青年马克思的〈穆勒笔记〉解读》,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3期;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 ③ 韩立新的相关观点见:韩立新《〈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马克思的转折点——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研究》,载《现代哲学》2007年第5期;韩立新《〈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韩立新《〈巴黎手稿〉研究——马克思思想的转折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 ④ 这篇文章的中译文见赖升禄、洪佩郁译:《〈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产生及其保存情况》,载于《马列主义研究资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辑。该句在第38页。德语原文见“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Entstehung und Überlieferung”, in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I/2, Berlin: Dietz Verlag, 1982, S.685-702。这句话的德语原文是: Die Exzerpte aus Ricardos und Mills Schriften sind mit hoher Wahrscheinlichkeit erst nach der Niederschrift von Heft III, d. h. nach den „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n“ entstanden.(S.696-697)
- ⑤ 除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三个笔记本外,马克思在巴黎时期还留下了对国民经济学的摘录性质的九个笔记本,其中包括《穆勒评注》。前者可称为《巴黎手稿》,后者可称为《巴黎笔记》。关于“巴黎手稿”与“巴黎笔记”这两个名称的界定和顺序,学界还存在诸多争议,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 ⑥ 着重引用这句话的论文有很多,例如:刘同舫《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再探析》,载《哲学研究》2007年第3期;李淑梅《人的类本质与对生产、交换异化的批判——重读马克思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载《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4期;周可《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资本概念》,载《哲学研究》2011年第4期;刘宗碧《〈巴黎手稿〉的双重异化批判和马克思新经济学逻辑的孕育》,载《哲学动态》2012年第11期;王代月《斯密的市民社会理论:马克思借以回到现实的经济学环节》,载《哲学研究》2015年第12期;赵义良《唯物史观的精神内核及其生成逻辑》,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张一兵《马克思:从他性交往异化到劳动异化——〈穆勒笔记〉再研究》,载《河北学刊》2022年第3期。
- ⑦ 在该卷出版时,德语正字法尚未实施。在德语正字法实施后,该句中的“Verhältniß”和“vorausgesetzt”按照规范应当分别写作“Verhältnis”和“vorausgesetzt”。本文在引用该句原文时采用与MEGA²著作中相一致的拼写方式,在分析该句含义时则采用德语正字法规范下的拼写方式。
- ⑧ 关于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的劳动异化与交往异化思想,参见李彬彬《货币异化:人的自我异化与相互异化——重估〈论犹太人问题〉在马克思思想历程中的地位》,载《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6期。

参考文献:

- [1] MARX K. Historisch-ökonomische Studien (Pariser Hefte)[M]//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IV/2. Berlin: Dietz Verlag, 1981: 455.
- [2]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4] 张一兵. 马克思: 从他性交往异化到劳动异化: 《穆勒笔记》再研究[J]. 河北学刊, 2022, 42(3): 42-52.

- [5] 张一兵. 经济学批判中的人本学话语: 青年马克思的《穆勒笔记》解读[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1998(3): 11-17.
- [6] 拉宾. 马克思的青年时代[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2.
- [7] 韩立新. 《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 马克思的转折点: 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研究[J]. 现代哲学, 2007(5): 1-15.
- [8]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2): 38.
- [9] 赵玉兰. 关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摘录笔记本”的编辑: 对话尤根·罗扬[J]. 国外理论动态, 2015(7): 2-9.
- [10] 鲁克俭. “陶伯特说”与“罗扬说”: 我们该采信哪个? [J]. 现代哲学, 2008(3): 1-11.
- [11] 姚顺良. 从“异化劳动”到“谋生劳动”: 青年马克思人本主义范式解构的开始: 兼与张一兵教授的“穆勒笔记”解读商榷[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0(7): 128-134.
- [12] MARX K, ENGELS F. Collected Works (Volume 3)[M].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5: 219.
-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4] 谏中和, 宣博方. 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主体路径的超越[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1(4): 32-41.

Alienation of social intercourse and alienation of labor: Revisiting Marx's early theory of alienation from a mistranslation case in *Comments on James Mill*

LI Binbin, ZHOU Siyan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n the Chinese edition of Marx's *Comments on James Mill*, there is a mistranslation of one crucial sentence in the original German edition, which concer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lienation of social intercourse and the alienation of labor. According to the correct comprehension of the original text, Marx regards the alienation of social intercourse as the presupposition of the alienation of labor. This reflect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 in Marx's early theory of alienation, namely its shift in focus from the alienation of individual labor to the alienation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Since the period of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Marx has paid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 of self-alienation and the alien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proposed that the sublation of the alien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sublating self-alienation. Through his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lienation of labor and the alienation of social intercourse in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Marx specifically discussed the economic connotations of these two types of alienation and suggested that the alienation of social intercourse is the presupposition of the alienation of labor in the *Comments on James Mill*. More importantly, Marx provided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two philosophical terms, namely the alienation of social intercourse and the alienation of labor. Marx pursued the practical sublation of individual alie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 which is an essenti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idealist theory of alienation. In this sense, the development of Marx's early theory of alienation itself gradually generated the initial element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ey words: Carl Marx; alienation; alienation of social intercourse; alienation of labor; *Comments on James Mill*

[编辑: 郑伟, 郑泽星]